

元代中国的建制城市^{*}

韩光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北京 100871)

提 要 中国古代城市市政建制出现于公元 12 世纪中叶, 发展成熟于 13 至 14 世纪前半期。其主要标志是都市警巡院和城市录事司的兴起。对城市实行专门行政管理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城市规模扩大及其职能完善的结果。本文就中国元代城市市政建制的职能及建制城市的规模和性质等城市历史地理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 城市历史地理 城市建制 城市职能 元代

中国古代城市市政建制创设于 12 世纪中叶, 发展完善于 13 世纪后期至 14 世纪前半期即元帝国统一中国、实行有效封建统治的时期。所谓市政建制就是对城市实行专门行政管理的都市警巡院和城市录事司; 在当时已有 120 余个城市先后建立了这种市政机构^[1],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建制城市。这些建制城市的兴起成为当时中国城市飞跃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 有必要对当时市政建制的职能及建制城市的性质和规模等城市地理问题作深入探讨, 以深化对 13 至 14 世纪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认识。

根据已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 拟选取置有录事司的集庆(今南京)、广州、镇江、嘉兴等城市为例探索之, 而置有警巡院的大都和上都城市已有相应研究成果, 故在此从略。但警巡院作为当时市政建制的重要形式之一, 其行政职能与录事司相类似, 故仍系本文研究的内容。

1 警巡院与录事司的市政职能

1.1 警巡院的设置及职能

都市警巡院创置于辽代五京, 系过渡性质的市政建制。金代除于中都置左、右两警巡院外, 东、西、南、北四京与上京亦均置有警巡院。金代诸京警巡院已成为独立的城市市政建制, 专门治理城市民事及各项行政事务^[2]。

元世祖忽必烈自开平迁都中都并创筑大都新城的过程中, 不仅恢复了中都城市左、右警巡院, 而且于中统四年(1263 年) 升开平府为上都路, 置上都城市警巡院。中都改称大都之后, 大都城市警巡院陆续增置为五个。各警巡院与两京京畿州县分别平行隶属于大都路和上都路^[2]。

元代两都各警巡院均置有达鲁花赤、警巡使(主官), 副使、判官(佐贰官), 典史(巡捕官)等官员和司吏等; 与京县设达鲁花赤、尹(主官), 丞、主簿(佐贰官), 尉、典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来稿日期: 1994 10; 收到修改稿日期: 1994 12。

史(巡捕官)及司吏极相类似,因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3]。其行政职能在于“领京师坊事”、“分领京师城市民事^[4]”,“领民事及供需^[3]。”

1.2 城市录事司的设置及其职能

金代,于诸京建置警巡院的同时,又于诸府节镇设置录事司,设录事、判官,“掌同警巡使”^[5],同时还置有用以验实户口的司吏。由此可见,金代录事司系于诸京之外的诸府节镇城市设置而类似诸京警巡院的市政机构,唯行政等级低一格。

元代,城市录事司的建置始于中统元年(1260年)。如永平路(原平滦路)和卫辉路两总管府在城录事司均置于是年^[6]。当时,录事司建置的原则是:“凡路府(按指诸路及总管府,而非散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7]按规定,“各路录事司与路所亲领之县与府、州之隶路者,低于路一字”,^[6]即录事司与路属府、州、县均低路一级,平行地隶属于路,为专门管理城市居民行政的独立市政建制。据《元史·地理志》,元代先后有123个城市设置了录事司,即有123个建制城市。设置时间主要集中在忽必烈即位之初和元朝统一江南之初两个阶段。按其变动情形,又分3种类型:一、由警巡院降置为录事司的城市有3个;二、因城市地位下降、人口减少录事司废入倚郭县的城市有20个;三、录事司地位稳定的城市有100个。因此,终元一代,包括置有警巡院的两都在内,共有稳定市政建制的城市即建制城市102个。

元初建置录事司,所管城市居民在2000户以上者,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2000户以下者,不置判官;至元二十年(1283年)后,增置达鲁花赤、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并置典史^[7]。自此而后,城市录事司机构即由达鲁花赤、录事(主官),判官(佐贰官兼捕盗),典史(巡捕官)和司吏组成^[7];与倚郭县置达鲁花赤、尹(主官),丞、簿(佐贰官),尉、典史(巡捕官)和吏相一致。惟录事司秩正八品,低于倚郭县。故在城录事司“列曹庶务,一与县等”^[8],系“司府城内户役^[9]”,领在城民事^[10]的独立市政机构。故城市即为建制城市。

总之,录事司与警巡院一样,系元代独立的城市市政建制。举凡置有警巡院和录事司的城市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建制城市。

2 元代中国建制城市的性质

按《元史·地理志》,除置有警巡院的大都和上都两建制城市外,据置有录事司的建制城市的稳定性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录事司建制稳定的城市均是总管府和路治所;二是录事司建制不稳定的城市一般是诸府散州治所。因此,置有录事司的城市首先是总管府或路的行政中心。总管府和路在元代系行省以下的二级行政建制,均领属有若干州县或府及录事司。据《元史·百官志》,诸路总管府除置有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行政、治安、司法、文牍等官吏外,还置有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学舍,分设教授,学正及学录等;置有司狱司,设司狱与司丞等;又置有平准行用库、织染局、杂造局、府仓、惠民药局、税务司等机构。因此,建制稳定的录事司城市又是区域性教育、文化、经济中心。集庆、广州、镇江及嘉兴均属这类城市。必须指出的是,若干置有录事司的城市还兼作行省治所,或行御史台、或肃政廉访司、或宣慰使司驻节地,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城市的行政地位和社会职能,扩大了城市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范围。如集庆录事司城市系全国两大行御使台之

一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驻地；而广州录事司城市则是广东道宣慰使司及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驻地，又为元代三大市舶提举司之一的广州市舶司驻地，因而使城市的行政与经济职能得到加强。

有关录事司城市的经济职能仍以上述四城市的一些统计数据为例加以说明。

2.1 集庆

据《金陵新志·田赋志》，集庆路领一司三县二州，拥有官民田土共77 528顷余，而在城录事司仅有官民田土76顷余，仅占路属总数的0.1%；全路岁办商税课钞7 405锭^①余，在城录事司岁办达5 174锭余，占全路总数的69.8%。可见在集庆录事司城市中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相当少，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及手工业劳动的人口占绝大多数；集庆城市系工商业活动繁荣的经济都会。

2.2 广州

据大德《南海志》，广州路所属一司七县官民田地总36 611顷余，其中在城录事司仅42顷余，占0.1%；全路税粮户28 177户，其中录事司仅176户，占0.6%；全路正科米12 434石^②余，在城录事司仅117石余，占0.9%；而商务税课钞全路岁办2 061锭45两，其中在城录事司达1 834锭12两，占8县司总数的89%；酒课，全路岁办3 202锭，其中在城录事司岁办1 892锭余，占59.1%；醋课，全路岁办56锭余，在城录事司岁办50锭余，占89.3%。这些统计数字也表明，元代广州城市酿造业繁荣，商贸活动活跃，而农业活动居极次要地位。广州已是一商业都会和外贸港市。

2.3 镇江

据《镇江志·赋税》，镇江路领一司三县，额征夏税丝绵10 439斤余，其中在城录事司额征仅3斤，占0.02%；额征麦20 930石余，其中录事司仅3石余，占0.02%；各项秋租米191 006石余，其中录事司仅9石余，占0.005%；而商务税课岁征达188 680贯^③，其中在城录事司岁征65 645贯余，占34.8%。可见，元代镇江录事司城市也是一个农业经济活动薄弱，而以粮食交易为主，商务活跃、交通发达的都会城市。

2.4 嘉兴

据《嘉禾志·征榷》，嘉兴路领四州县司，岁办税课15 477锭余，其中在城录事司3 420锭，占22.1%。但值得注意的是，嘉兴录事司除领有在城70坊外，还领有城郊五乡17里。嘉兴录事司兼领城市和近郊乡村两个类型的社区。嘉兴城市是一个拥有一定规模的商务及织造手工业活动而又与乡村保持直接行政和经济联系的城市。

通过上述统计数字的分析和比较，不难发现，元代建制城市已发展为以商业服务和手工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区域经济中心，而城市居民的农业活动则相应退居极次要地位，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劳动分工的高度分化。同时，因建制城市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影响及其地理区位与交通条件的制约，又表现出城市经济职能在某种程度上的明显差异。按元代商务税课三十税一制度，在上述四个城市中，广州城市以商贸与酿造为核心经济职能，年税课

① 旧时货币单位，所用金银币，铸为一定形状，名曰锭。按《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即锭）五十两，其值百贯。……每两折钱二贯。”元沿金制，银一锭价值五十两、一百贯，见《南村辍耕录》卷30《银锭字号》。一贯千钱。

② 容量单位，市面通称，一石十斗。谷物不同，一石的重量略有差异，一般在120市斤（即60kg）上下。

③ 旧时货币单位，由银一锭价值五十两、一百贯知，银一两值二贯。一贯值千钱。

总计3 776 锭余,年商贸成交额达113 280 余锭,约合1 133 万贯^①;集庆城市以织造、酿造、手工业为核心经济职能,年税课5 174 锭,年商贸成交额达1 552 万余贯;镇江城市则以粮食交易及交通服务为核心经济职能,年税课65 645 贯,商品成交额 197 万贯;嘉兴城市则以纺织、粮食交易及酿造为核心经济职能,年税课3 420 锭,商品成交额达1 026 万贯。由此可见,元代录事司城市商贸和手工业经济与交通服务职能较古代城市有了明显的增长和飞跃发展。

总之,元代录事司城市既是不同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又是不同行政区域的经济中心,甚至因某些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区域经济中心的职能变得异常突出。因此,元代某些建制城市的经济职能已超越区域行政建制的等级,上升为大区域乃至全国性的经济都会和贸易港市。

3 元代建制城市的户口规模及户口特征

3.1 元代建制城市的户口规模

城市规模一般以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两个主要指标来衡量。为简化内容,突出重点,仍以上述四个录事司城市的户口规模为例,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建制城市的性质与职能。

3.1.1 集庆

据《金陵新志·民俗志》,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集庆路共226 379户,约1 285 865口;其中在城录事司属下户18 205,人口94 992(表1)。由“金陵之降,市不易肆,休养生息,几及百年,生齿日繁”^[11]的记载及元代人口增长的一般过程推算,至正初年集庆城市录事司人口可达到14万人上下。

表1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集庆路及录事司户口统计

Tab. 1 Census of Jiqing in 1290

路司	户口	南人	其中军站匠户	无名色户	北人	其中色目人	汉人	合计
集庆路	户	222060	12336	209724	4319	202	4117	226379
	口	1261301	64311	1196990	24564	3959	20605	1285865
录事司	户	15104	5875	9229	3101	149	2952	18205
	口	79191	26027	53164	15801	2919	12882	94992

3.1.2 广州

据《南海志·户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广州路8司县共有172 284户,僧道1 835名。至大德八年(1304年)增加到180 873户,其中城市录事司10 013户(表2)。按元代中期广州城市“比年官府肃清,盗贼宁息,人皆安生乐业,故广之生齿日繁,户计日增”^[12]和“广州为岭南一都会,户口视他郡为最”^[13]的历史事实及至元二十七年至大德八年广州路户增长率4‰推算,到元顺帝至正初,广州城市录事司属户可达1.4万户,7万余人。

① 不含市舶抽分。

表 2 大德八年（1304 年）广州路及录事司户统计

Tab. 2 Census of Guangzhou in 1304

路 司	总计（户）	其中南人（户）	北人（户）	僧道（名）
广州路	180873	180323	550	1835
录事司	10013	9641	372	417

3.1.3 镇江

据《镇江志·户口》，至顺初年，镇江路所属 4 县司共计户 113 767，口 649 992；其中城市录事司属户 15 654，口 65 767（表 3）。按元代户口增长的一般过程推算，到元顺帝至正初年，镇江城市户口可达到 1.6 万余户，7.5 万余人。

表 3 至顺初镇江路及录事司户口统计

Tab. 3 Census of Zhenjiang in 1331

路司	户口	土著	侨寓	客户	单贫	总计
镇江路	户	100065	3845	5753	4104	113767
	口	613578	10555	14380	11479	649992
录事司	户	9469	3399	1394	1392	15654
	口	48537	8978	4385	3867	65767

3.1.4 嘉兴

据《嘉禾志·户口》，至元二十七年嘉兴路 4 州县司共有 459 377 户，其中城市录事司所属 6 581 户（表 4）。按元代户口增长实际状况推算，到元顺帝至正初年，嘉兴城市录事司属户约 0.8 万户，4 万人。

表 4 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嘉兴路及录事司户统计

Tab. 4 Census of Jiaxing in 1290

路司	民户	儒户	僧	尼	道	急递铺户	总计
嘉兴路	453429	1088	4228	337	152	143	459377
录事司	5504	483	434	52	108		6581

上述四个城市分别代表了元代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其中以集庆、广州、镇江为代表，凡行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宣慰使司驻节地兼总管府或路治城市，又是大区域物资集散与商业贸易中心及交通枢纽地的录事司城市人口规模在 7 万人以上。以嘉兴为代表，凡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路治兼区域性物资集散和商业贸易中心及交通要冲的录事司城市人口规模在 4 万人以上。位于南方一般经济发达区的路治及位于北方的总管府及路治录事司城市人口一般在 1 万至 3 万人左右。那些未置录事司即非建制的诸路散州治所城市人口规模一般在 0.3 万至 1 万人上下。

3.2 元代建制城市的户口特征

据上述四表及有关记录，元代建制城市户口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3.2.1 元代建制城市户口的户籍和民族构成复杂,户类多样。表1录事司所属南人户口包括军、站、匠、医、儒、乐人、阴阳、淘金、弓手、财赋佃户、急递铺户等,而在所属北人中则包括蒙古、辉和尔(按即维吾尔)、回回、契丹等色目户和汉人户。表3录事司所属土著户口实即南人户口则包括军、站、匠、民、儒、医、乐人、弓手、急递铺、财赋、驱口等户口,而侨寓户口则包括蒙古、维吾尔^①、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等户口,共计3 399户,8 978人(表5)。

表5 至顺初镇江路与城市录事司侨寓户口的民族构成

Tab. 5 National components of Zhenjiang in 1331

路司	户口	蒙古	维吾尔	回回	也里可温	河西	契丹	女真	汉人	合计
镇江路	户	29	14	59	23	3	21	25	3671	3845
	口	163	93	374	106	35	116	261	9407	10555
录事司	户	23	12	49	19	1	19	25	3251	3399
	口	125	81	296	93	19	104	261	7999	8978

根据封建国家的各种特殊需要,签发并固定城乡人户的职业,进而确定其户籍,并分属不同系统,是元代户籍制度的突出特点。上述建制城市的户籍与户类构成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录事司军、站、匠户在土著户中所占比重较路属同类户比重偏高,如镇江,前者占25.7%,而后者仅占9.5%;集庆,前者占38.9%,而后者仅占5.6%。军、站、匠户集中聚居区域中心城市不仅符合客观历史事实,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录事司城市的职能与性质。

事实上,上述北人与侨寓户口的含义相同,均指元朝统一南宋过程中迁居南方的北方户口,包括官吏、军户、商旅乃至僧道等;他们在各录事司城市中均占有一定比重,故而建制城市户口的族属变得复杂起来。这是元代多民族国家在建制城市户口民族构成上的重要反映。

3.2.2 南方建制城市户口均以南人即土著户口占绝对多数,而北方人即侨寓户口所占比重受城市区位和交通条件制约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距北方近且交通便捷的镇江城市,侨寓户与口分别占21%和13.6%;集庆城市次之,分别占17%与16.6%;而远离北方且交通不便的广州,侨寓户仅占城市户的3.7%。在各相应路府区域侨寓户口的比重均低于建制城市,且亦遵循距离衰减规律:镇江路侨寓户口分别占路属总户口的3.4%与1.6%;集庆路侨寓户口均占1.9%;广州路侨寓户则仅占0.3%。这些数据表明,来自北方的移民主要侨寓在录事司城市中,且伴随城市和北方距离的扩大比重减小。镇江路侨寓户的88.4%,口的85%。集中在录事司城市更有力地说明了侨寓户口集中聚居城市的特点。

3.2.3 建制城市户量(每户口数)低于所在路府全部户口的户量,侨寓户口的户量低于土著户口户量。至顺初镇江录事司户口户量为4.2,而路属总户口户量为5.7;路属侨寓、客户及单贫户口户量为2.6,而路属土著户口户量为6.1;录事司城市侨寓、客户、单贫户口户量为2.8,而城市土著户口户量为5.1。至元二十七年集庆路录事司城市户口户量为5.2,

^① 古代文献中记为“畏吾儿”,文中出现不妥,故改用今族名,下同。

表 6 元代 102 个建制城市的地域分布结构

Tab. 6 The distribution of 102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in Yuan Dynasty

省 区	建 制 城 市 名 称 (今 市 镇 名)	总 数
中书省	大都 (北京市)、上都 (废弃)、大同 (大同市)、永平 (卢龙)、保定 (保定市)、真定 (正定)、顺德 (邢台市)、广平 (永年镇)、彰德 (安阳市)、大名 (大名*)、怀庆 (沁阳市)、卫辉 (卫辉市)、河间 (河间市)、东平 (东平)、东昌 (聊城市)、济宁 (济宁市)、益都 (青州市)、济南 (济南市)、般阳 (淄博市淄川)、冀宁 (太原市)、晋宁 (临汾市)	21
辽阳行省	大宁 (废弃)、东宁 (废弃)	2
南江北行省	汴梁 (开封市)、河南 (洛阳市)、襄阳 (襄樊市)、蕲州 (蕲州市)、黄州 (黄州市)、庐州 (合肥市)、安丰 (寿县)、安庆 (安庆市)、扬州 (扬州市)、淮安 (淮安市)、中兴 (江陵)	11
陕西行省	奉元 (西安市)、巩昌 (陇西)	2
四川行省	成都 (成都市)、嘉定 (乐山市)、顺庆 (南充市*)、重庆 (重庆市)、夔州 (奉节)	5
云南行省	中庆 (昆明市)、大理 (大理市)	2
江浙行省	杭州 (杭州市)、湖州 (湖州市)、嘉兴 (嘉兴市)、平江 (苏州市)、常州 (常州市)、镇江 (镇江市)、建德 (梅城镇)、庆元 (宁波市)、衢州 (衢州市)、婺州 (金华市)、绍兴 (绍兴市)、温州 (温州市)、台州 (临海市)、处州 (丽水市)、宁国 (宣州市)、徽州 (歙县)、饶州 (波阳)、集庆 (南京市)、太平 (当涂)、池州 (贵池市)、信州 (上饶市)、广德 (广德)、福州 (福州市)、建宁 (建瓯)、泉州 (泉州市)、兴化 (莆田市)、邵武 (邵武市)、延平 (南平市)、汀州 (长汀)、漳州 (漳州市)	30
江西行省	龙兴 (南昌市)、吉安 (吉安市)、瑞州 (高安)、袁州 (宜春市)、临江 (临江市)、抚州 (临川市)、江州 (九江市)、南康 (星子)、赣州 (赣州市)、建昌 (南城)、广州 (广州市)、韶州 (韶关市)、潮州 (潮州市)	13
湖广行省	武昌 (武汉市武昌)、岳州 (岳阳市)、常德 (常德市)、澧州 (澧县)、兴国 (阳新)、天临 (长沙市)、衡州 (衡阳市)、道州 (道县)、郴州 (郴州市)、永州 (永州市)、全州 (全州)、宝庆 (邵阳市)、武冈 (武冈)、桂阳 (桂阳)、静江 (桂林市)、南宁 (南宁市)	16
总计		102

资料来源:《元史·地理志》、《元一统志》。

* 城址转移者; 今地名截止 1991 年资料。

而路属总户口户量为 5.7; 路属侨寓汉人户口户量为 5, 而路属土著户口户量为 5.7; 录事司城市侨寓汉人户口户量为 4.4, 而城市土著户口户量为 5.2。录事司城市户口户量低的主要原因是, 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所提供的手工业、商业与社会服务业就业机会首先吸引

了一定数量的侨迁和单贫等缺乏生产资料而拥有劳动力的户口集聚城市，而这部分户口户量一般偏低。侨寓户口，除官僚、军户、富商巨贾户量明显偏高外（如至元二十七年集庆路色目人 202 户，达 3 959 人，每户 19.6 口），其余侨寓户口一般系因政治和经济原因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迁移南下者，故户量偏低。他们的集中聚居往往又导致所在城市或区域户量的降低。

3.2.4 路府区域建制城市户口所占比重偏低，且差异很大，至顺初镇江城市人口占镇江路人口的 10.1%，至元中集庆城市人口占全路人口的 7.4%，大德中广州城市户占全路总户的 5.5%，至元中嘉兴城市户占全路户的 1.4%。不同行政区域建制城市户口所占区域户口的比重，与城市自身的经济职能和行政地位息息相关。

4 元代中国建制城市的地域分布

城市的兴起及其地域分布结构既是区域经济开发和人口集聚的结果，又是区域城市空间发展的未来基础。事实上，元代稳定建制的 102 个城市，历经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发展，已有 72 个发展为现代化城市，占 70.6%；有 23 个演变为当今县城，占 22.5%，其中的一部分目前也已逐步具备建制现代城市的条件；有 4 个衰落为一般城镇，也有 3 个即大宁、东宁和上都最终废弃了。从而表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良好历史继承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元代建制城市的地域分布结构也为当今中国城市空间分布构建了框架（表 6、图 1^①）。元代 102 个建制城市在现行省市区划中的分布如表 7。

表 7 元代建制城市在现行省市区划中的分布

Tab. 7 The present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in Yuan Dynasty

省 市 名	北 京	河 北	山 东	山 西	内 蒙 古	辽 宁	河 南	陕 西	甘 肃	安 徽	浙 江	江 西	江 苏	福 建	湖 南	湖 北	广 东	广 西	四 川	云 南	合 计
城市数	1	8	6	3	2	1	4	1	1	8	11	12	6	8	11	6	3	3	5	2	102

元代中国建制城市地域分布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1）地域分布不平衡

102 个建制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两大区域，而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密度大。这些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开发历史悠久，人口密集，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发达地区和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所在，具备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深厚基础，且城市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好。而在东北、西北、西南及岭南的广大边远地区，因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及人口集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缺乏城市广泛兴起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故规模较大可形成建制城市的城镇相当稀少，仅有的建制城市也均是在特殊地理区位上因某些政治因素成长起来的。

（2）在南北城市群之间即淮河迤北至秦岭东西一线形成明显空白地带，这里基本不存在建制城市

宋金对峙，这里曾是兵连祸结、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战争后的河南、陕西、徐海以南，

① 本图仅反映元版图内拥有建制城市的地区，特此说明。

- 8 至顺 《镇江志·宰贰》。
- 9 于钦 《齐乘·郡邑》。
- 10 《元一统志》卷 8.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杭州路。
- 11 至大 《金陵新志》卷 8. 民俗志。
- 12 大德 《南海志》卷 6. 户口。
- 13 赵秉文 《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 《闲闲老人釜水文集》卷 11。
- 14 《金史》卷 92. 曹望之传。
- 15 周密 《齐东野语》卷 5. 端平入洛。

RESEARCHES ON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IN YUAN DYNASTY (AD 1260-1368)

Guanghui Ha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Key words historical urban geography,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urban function
Yuan Dynasty

Abstract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ppeared in the mid-12th century, developed and matured in the 13th and the first half of 14th century. The main sign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gxunyuan (municipal council) and Lushisi (municipality).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D. 1260-1368) there appeared 123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of which 102 were developed steadily.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on on cities was both the objective demand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result of urban expansion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uch number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is the important sign of the then leading status of the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functions of municip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cales and characters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in Yuan Dynasty.

Jingxunyuan (municipal council) were founded only in the two capital cities: Dadu and Shangdu, where municipal magistrates, just like those in adjacent capital counties, administrated the civil affairs, taxations and corvees of urban residents. Lushisi (municipality), whose administrative level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Jingxunyuan, were generally founded in Zongguanfus (great regional capital) or Luzhis (provincial capital). Magistrates just like those in adjacent provincial capital counties were also appointed, and they administrated the same issues as those of Jingxunyuan magistrates. Commanded by Lus (province) and Zongguanfus, and paralleled with suburban Zhous (small cities) and counties, Jingxunyuan and Lushisi were independent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in Yuan Dynasty.

Having been region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enters,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developed into regional economic centers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ies. This can be proved by the economic statistics of Jiqing (Nanjing at present), Guangzhou (Canton), Zhenjiang and Jiaying.

The urban population varied greatly in different cities owing to distinct economic, social and physical factors. In the late Yuan Period (about A.D. 1345), the population in Jiqing reached 140 000; Guangzhou and Jingjiang reached 70 000; Jiaying reached 40 000. They were the typical different scale cities. As a country with diversified nationalities, Yuan Empire made complex nationalities and household structures in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ities. For example, the population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in South China were mainly Nanren (southern people), while richer northern migrants constructed a certain ratio.

With regard to the region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two capitals in which Jingxunyuans were set up were located at the edge of the north agriculture-stock raising interlocking area; more than 100 cities with Lushis were in the following two regions: Huabei (northern China) and middle and low Yangtze River Basi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there was a obvious empty area. This geographic character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ities is the result of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al and migrational development.

作 者 简 介

韩光辉, 1948年2月出生于山东泗水, 1987年获北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88年至1989年赴前苏联进修, 1990年任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副教授。发表历史人口地理与城市历史地理论文数十篇。